

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与毛泽东长谈12小时

□ 徐春辉



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又译根室·史坦因），出生于德国柏林，1941年加入英国国籍。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任《中国空邮》编辑和自由撰稿人，1941年至1944年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波士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是一名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中国的外国记者。1944年，他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近5个月，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长谈，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被收入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斯坦因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边区社会建设和八路军的战绩等情况都有了深入了解，也促使他撰写《远东民主的种子》《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文章和书籍，把“红色中国”的魅力传播到了国内外。

“我看的越多，我的怀疑就越少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遏制共产党的发展，在各方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压制和封锁。1939年秋开始，国民党政府不仅时常攻击、抹黑共产党，而且严格禁止新闻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擅自进入封锁区采访，引起外界越来越多的不满和疑惑。作为驻重庆记者，斯坦因非常关注事实真相，多次申请到封锁区采访，都没有得到批准。1944年2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斯坦因等10位外国记者联名信给蒋介石，再次要求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了采访要求。

5月17日，斯坦因以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身份，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参观团一行21人，从重庆出发，于5月31日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抵达延安，受到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初到延安，斯坦因最大的感受是“自由”。在来到延安之前，参观团按照国民党要求，先去采访了西安、山西等国民党统治区，那里的官员处处设防，监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访问项目受到严格限制，斯坦因感慨，像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来自潜在的敌对国家的贵宾”。但是，在延安，虽然共产党非常重视中外记者的访问，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但“并不故意给我们什么印象”。斯坦因记述：“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那里去就到那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追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访问之前，斯坦因一直不解：一个小小的延安，如何来和重庆争胜呢？6月9日至7月12日，他与参观团其他成员一起，集体参观了政府机关、军队、工厂、农场、学校、医院、法院、监狱，参加中共组织的各

种报告会、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参访活动，斯坦因对边区已有一定了解，他初步得出结论：延安与重庆在“气氛”上有明显的不同。他注意到，这里虽然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没有摩托交通，没有可以航行的河流，也没有飞机从外面运入物资，但这里充满了欢乐与信心，斯坦因不由自主感慨，“我看的越多，我的怀疑就越少了”。

“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在发表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通讯报道中，斯坦因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

在延安期间，斯坦因与毛泽东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6月1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斯坦因提出单独采访的要求。7月14日，斯坦因与毛泽东长谈12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他记述：“当深夜三点，我神志困顿，两腿疼痛……最后告辞时，他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他提出各种各样问题，毛泽东都不厌其烦，一一作答。结束后，为了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他不仅把访谈要点翻译成中文请毛泽东校正，在对外宣传时也没有添加任何个人的主观评论。

7月12日，参观团中的中国记者和国民党官员返回重庆，斯坦因等5位外国记者坚持继续留在延安采访。随着实地参访的深入，他发现中共非常注重向群众学习，要求边区干部要“严肃努力的去采取‘群众观点’”。斯坦因多次突击拜访边区民主议会，亲眼看到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农民、地主、商人、绅士们很乐意这样的机会，积极参与讨论，议题涉及农业、工业、造林、教育、卫生等方方面面。他还看到大学不识的老百姓，通过“豆子投票”参与选举。对于亲眼目睹的一切，斯坦因赞叹不已，他认为“这一点成就是毫无疑问的”。斯坦因曾用几天时间整理了一本“共产党字典”，他把“人民议会”称为中共独创的“特殊的政治术语”，作了详细分析和介绍。

此外，“劳动创造一切”的政治理念，也让斯坦因感到十分意外。他看到，在经济封锁造成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边区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尽量生产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吴满有是1942年边区老百姓推选出来的劳模，也是被毛泽东称赞为解决粮食短缺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他所在的村子“吴家枣园”也发展成了模范村。斯坦因与他有过多次交谈，还亲自去参观他的家乡。在这里，他实际观察到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看到了边区乡村建设的进步。不但如此，斯坦因还惊奇地发现，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给老百姓做出劳动榜样，边区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承担农业及其他生产工作。他为此感慨：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百姓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

“要把所见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

事实上，除了实地参观，与边区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座谈之外，斯坦因还经常接触各个阶层以及边区的外国人，他经常向许多从前方来的指挥官和士兵打听，向战区的政工人员打听，向跟八路军一起工作多年的林迈克和马海德大夫打听。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斯坦因单列了“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一部分，详细记述了“别人”眼中的中共 and 边区。美国的飞行尉官告诉他，“我愿意回国做个讲演旅行，把中国共产党的真相告诉我们美国人民”；林迈克和马海德“都说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对于边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甚为称赞”。当斯坦因询问“八路军对待人民确是和我在延安每个人所告诉我的那样好么”时，得到的答案是：“从未听过如国民党的流言所说的共产党烧杀或虐待人民的事情。”

8月中旬，斯坦因与其他4位外国记者一起，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再次印证了他的所见所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在系统报道参访情况时曾提到：“记者团诸先生一致表示：要把所见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事实上，在延安期间，斯坦因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撰写了100多篇电讯稿，但大多数都被国民党中宣部新闻检查人员扣检或删除了主要内容。

10月2日，斯坦因离开延安，结束了近5个月的访问。回到美国之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文章与出版书籍，为国内外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在其著作《伟大的道路》中称赞说，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对抗日根据地情况的客观而详实的报道，令人为之折服。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搭桥”

□ 王俊

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是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中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早年师从瑞典著名汉学家北欧传统汉学的代表人物高本汉，专攻汉语以及中国音韵学，尤其擅长中国西南官话语音的翻译，成绩斐然。他的翻译作品，不仅有《诗经》《楚辞》《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史记》《春秋繁露》《水浒传》《西游记》等系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鲁迅、闻一多、沈从文、北岛、莫言和曹乃谦等几十位现当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选材涉及古今诗词、小说、戏剧、哲学和史学著作等不同文体类型。可以说，马悦然不仅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和汉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而且在推动中瑞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如果说，早期翻译是为马悦然从事传统汉学研究服务的，那么后来翻译已然成为他追求中国文学独特美学价值的主动性行为，并推动北欧汉学从传统向现当代过渡。在其他国家文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马悦然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汉代乐府是真正的民歌，而宋词也是来自普通民众的歌声，再由诗人发展为高雅的文体。这些出于人民发自内心的唱词是由真实生活淬炼而来的感情，蕴藏着最为真诚动人的力量。他认为，具备必要语言能力而且对文学感兴趣的汉学家除了专厚研究以外，还应当借助所学的知识把喜欢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从而使西方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更深厚的兴趣。马悦然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和热爱，还源自于他早年在四川研究方言时的经历。中国山水的秀美，当地人对外国他乡之人的友好与关怀，乡下极为朴素的生活

（二）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的互译和相互渗透。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而一个民族的优秀作品要成功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员，翻译是必要途径。源语与译入语的世界观可能迥然不同，“文字从一种文化环境被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去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解”。因此，必须懂得“翻译一个文本也是翻译一种文化”这个道理。如果译入语的读者不熟悉源语承载的文化因素时，那么就需要在前言或者导语中将这些文化要素集中阐明。在马悦然看来，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因为翻译的缘故而未能被西方接受。马悦然认为，一个作家当然主要为自己的

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STUDYTIMES

學習時報

07

同事们服务，但是他也希望其作品能够超越语言的界限。要超越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译者架设的桥梁。马悦然认为，由于受西方语言的腐朽和专横式的要求所掣肘，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译者会被迫明晰化原作没有的细节，从而不能传达中国文学蕴涵的独特普遍性和无时间性。因此很多人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但仍有一些译者成功地突破了这一文化边界，将中国文学的不朽之作译介给了西方，如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这充分证明了通过语言的互译，文化的互通共融在实践层面是可以实现的。

著名解释学家加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视域交融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话过程。与这种哲学阐释学的翻译观相契合，马悦然也将翻译看作是作者和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对话。而按照马丁·布伯的划分，对话可以分为“主体—主体”的模式和“主体—客体”的模式。在马悦然看来，作者和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借助翻译，体现出来的应该是“主体—主体”之间的交互、坦诚和共享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操纵、征服和利用的不平等关系。这实际上是对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一种反拨，进而把翻译从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上升为一种主体间交往对话的关系，并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融合。

（三）

翻译要注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马悦然特别注重语言形式，尤其是方言成分的翻译。因为，方言成分在表现作者审美旨趣和体现地域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像诗歌这种文学作品，诗人运用的方言不仅决定了语言的节奏，而且决定了诗歌的格律。在马悦然看来，不懂乐山话就很难体会郭沫若《女神》的音乐之美。而如果不知道鲁智深和杨志这两个《水浒传》中的经典角色是关西老乡的话，就很难发现只有他们会用“洒家”作为第一人称。因此，翻译应该尽量准确地

表现原文中的方言特色，并在译文中进行恰当的模仿。翻译除了要注意语言形式特征，还要努力将其效果传达出来，因为有趣味的形式也是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品美学价值和独特性的体现。

译者需要具备一种“克己”意识。译者必须服务于原作，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其上。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含义，甚至包括原文的形式和结构所勾连的意义。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如此。西方从事汉语文学翻译的译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此为止的职业翻译，水平不一而足，而且通常没有翻译作品的选择权。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特点是具备必要的语言基础，对文学充满兴趣并且可以自由地抉择想要翻译的作品。第三类翻译家本身就是作家或者诗人。他们翻译态度较为随意，还会通过译作展现自身的创造力。而马悦然将自己归为第二类，并把向瑞典同胞译介中国的文学作品视作己任。文学翻译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在此过程中，作为发现人和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在马悦然看来，一个译者肩负着两重责任，一重责任要不负原文的作者，另一重责任要对得起他的读者。因此，那种顺遂译者，任意裁剪语言、文化和文体的做法，马悦然是极不赞同的。而忠于文本，不增加，也不删减，忠实传递两个文化之间的信息，则是马悦然一直恪守的翻译准则。

马悦然既具有出众的语言天赋，又具有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鉴赏力，两者的完美结合使他扮演了一种学术研究和文化中介的跨界角色，也成就了他成就斐然的翻译人生。作为一位颇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汉学家、翻译家，他促成了瑞典和中国之间的很多文化交流活动，为加深中国和瑞典相互了解作出了重大贡献。



太阳神鸟金饰：让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生

□ 荆晓燕

2023年7月28日晚，在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上，“太阳神鸟”穿越时空翩然而至，从开幕式倒计时到梦幻的点火方式，它的形象贯穿始终，实现了内在文化意蕴与外在观赏效果的完美统一。

“太阳神鸟”的形象源于何处？

1986年，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一醒惊天下”，成为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2001年2月，成都市金沙村地下出土大批珍贵文物，被命名为“金沙遗址”。三星闪耀，金沙溢彩。作为古蜀文化的两次发展高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犹如青铜时代的“双子星座”，共同呈现了中国西南早期青铜文化的基本风貌。两个遗址共同作为“古蜀文明遗址”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双方已经签约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三星堆遗址的代表文物包括大量精美神奇的青铜人像鸟兽、神树器物、纵目面具等，而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一件用黄金薄片制作的圆形镂空饰品。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印的《金沙淘珍》一书把这件金片饰品称之为“金四鸟绕日饰”，后来人们更习惯称它为——太阳神鸟金饰。它目前收藏于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于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太阳神鸟金饰是一件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精品，总体为圆形，由金箔片经过精心刻画、切割而成，呈现出剪纸般的镂空形状，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约20克。内层图案由等距分布的12条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像一个转动的漩涡，又像太阳发出金光；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首尾相接的“三足鸟”构成，四只鸟向着同一方向逆时针飞翔，与内层旋涡的旋转方向相反。整个图案极富设计感，线条流畅，简洁明快，既有和谐平衡的秩序感，又有变化交错的律动感，让人印象深刻。除了构图精美外，它的工艺也很精湛，薄如蝉翼，切割细致，体现了古蜀先民娴熟精湛的锤鍊与切割技术。古代冶炼水平有限，常见的金器含金量一般不超过80%，而太阳神鸟金饰在金沙遗址出土的所有金器中含金量最高，达到了令人惊叹的94.2%，体现出相当高超的冶炼水平。

太阳神鸟金饰不是一件简单的装饰品，作为祭祀用品，它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寓意，体现出古蜀先民的宗教思想和信仰体系。三足鸟比较符合中国神话中“金乌”的形象特征，因而太阳神鸟金饰很有可能是“金乌负日”这一传说的具象展示，是古

蜀先民太阳崇拜和神鸟崇拜的物化体现。另外，太阳神鸟金饰中的数字也是深有寓意的，有研究认为，外层四只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流转，而内层的十二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如果这种推断成立，就说明当时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年岁、四季、月份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从构图上来说，太阳神鸟金饰采用内外层双向旋转结构，旋转意味着循环往复，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美好寓意。

有考古专家指出，“金沙先民们对于日出月落、四季更替，尤其是太阳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有细致观察和深刻体会。他们所创造的代表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观念的黄金制品，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世界、天地万物最为朴实而自然的表达，更以其几近完美的艺术赋形，为世界美术史、上古思想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典范之作”。可以说，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先民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因为其别致的图案和美好的寓意，它在现代广受喜爱，已经成为成都城市形象标识的主题图案，其形象在公交、博物馆、机场、立交桥上随处可见，可谓深度融入成都市民的生活。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从1600余件候选文物中脱颖

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因为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2005年10月，绣有“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进入太空；2023年5月，它的图案随我国首个沉船水下永久测绘基点进入深海。让“太阳神鸟”上天入海、自由翱翔，这是独属于中华文化

的浪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太阳神鸟真的“活”起来了，它不仅仅是一件来自远古的珍贵文物，更凝聚着、传递着、延续着中华文明向光而行、生生不息的美好追求。如今的太阳神鸟，已经飞出成都，飞出四川，飞出中国，飞向世界。“太阳神鸟”曾经见证古蜀先民的高超智慧与精神追求，它也将继续见证当代中国人赓续文明血脉、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